

方志学两种

方志今议 黎锦熙

方志商 甘鹏云

岳麓书社

方志学两种

方志今议 黎锦熙

方志商 甘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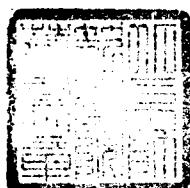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51037

岳麓书社

一九八三年·长沙



951037

方志学两种

黎锦熙 甘鹏云

责任编辑：李传书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38,000 印张：6.5 印数：1—5,900

统一书号：11285·21 定价：0.92元

总 目

《方志学两种》序.....	朱士嘉(1)
方志今议	黎锦熙(9)
方志商.....	甘鹏云(155)
后 记.....	(195)

《方志学两种》序

朱士嘉

《方志学两种》，一为《方志今议》，湖南省湘潭县黎锦熙（字劭西）所著；一为《方志商》，湖北省潜江县甘鹏云（字药樵）所著。

《方志今议》是一九三八年黎锦熙在城固续修县志委员会领导下主编《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而成的。全书分十门：一、建议因缘，二、先明三术，三、次立两标，四、次广四用，五、终破四障，六、结前原则，七、县志拟目，八、纂修总例，九、材料来源，十、总结全文。其第七门县志拟目下又分五个子目：一、全志之总纲，二、关于自然方面者，三、关于经济方面者，四、关于政治方面者，五、关于文化方面者。每个子目又分若干篇，共计三十篇。

当时因抗战关系，暂设陕西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各学系的老师响应黎锦熙的号召，带领学生踊跃参加《方志今议》的编写工作，例如黄国璋分任自然篇和经济篇工商、交通二志；何士骥、罗根泽、吴世昌等分任文化篇；殷祖英分任气候志；张遇骏分任地质、地形、水文三志；刘慎谔分任生物志；胡庶华分任农矿志；谌亚达分任人口志；龙文分任合作、卫生、祠祀三志；张永宣分任大事年表、疆域沿革表；陈瑾分任财政志；薛祥绥分任人物志、艺文志及文征等。

黎锦熙自序已提到上述这些情况。另外，他说：“政治诸篇，则从唐君祖培处假得汉中一区、城固一县之行政报告表册等而钩稽归纳以成纲目；至于逐项各举地方实例（双行夹注载入各篇），则多由杂览周咨或清谈闲话而来。就城固言，各方面之要况实已载其大略。”

由此可知，这部书是以黎锦熙为首的十四位老师和许多同学，团结互助，克服困难，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是集体智慧得到充分发挥的表现。

《方志今议》是什么性质的书？具有那些观点、特点、作用和影响？

作者自序说：“本书乃史家所谓‘论史法’之书，而非‘史’也。”

实质上，它既是一部在批判继承传统“史法”包括章学诚方志学说的基础上，结合大量史料的整理分析，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创造性地构思、设计、编纂而成的史学论著；又是一部理论联系实际，着重探讨方志性质、地位、作用及其编纂法的方志学专著。

方志具有什么性质、什么作用呢？

作者认为方志是“史地两性，兼而有之”的著述，既是“地志之历史化”，又是“历史之地志化。”作者强调：方志“须将境内事事物物，穷原竟委，非但考其迹象之沿革而已，必使读者能就演变之实况，推知驱引之总因。”也就是说，读者在明了事物怎样发生、为什么发生之后，可以从中找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掌握了规律，就能“定施政设教之方针，亦待此而后能备纤悉周到之方案，而后能谋部分具体之实践。”

这个观点，比章学诚前进了一大步。章氏胶执方志为史之

说，视方志为“一方之全史”，其作用仅限于“为国史要删”、“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等等。

作者虽受章氏方志学说的启迪而“好览方志”，但当他在编写《方志今议》的过程中发现章氏的“四体”：纪、谱（图、表）、考、传，已不适用时即指出：“今当首破此障，文无伤质，以后方志，决不当再以文章体裁分类。”接着，他大胆地创设了《县志拟目》，除“全志之总纲”三篇外，其他二十七篇大体上是按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这个合乎逻辑的顺序铺排并且加以举例说明的，这就便于读者了解各个篇目既有显著区别又有内在联系；对于了解城固县过去和现在事物发展的规律，不是没有帮助的。

关于方志的作用，作者提出三点看法，值得介绍：

一、对自然资源进行认真的调查整理，编入方志，可供振兴工业的参考。

二、方志不但是学生向民族英雄学习的好教材，其中方言一门，“要其最大用处，实在本邑之小学，国语一科，字读国音，词有标准。教学之际，须举土俗，比较异同。县志此门，兼供斯用。”

三、方志不是“一邑之高文典册”，而应从了解现情出发，编成一部于“旅游指导”有益的参考书。

至于地方年鉴，作者认为可作为县志的“长编”，由县而至推广至省、至国以至世界，功用宏大，因此，是值得提倡编辑的。

从表面看，《方志今议》是专为编写《城固县志》而作，但它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部分经验，已概括、上升为理论，而这种理论既是那么精湛，又有说服力，所以对于我们编修社会主义省志、市志和县志，仍有现实的参考意义。（书中所列篇目如地质志、水文志、土壤志、生物志、工商志、交通志、财政志、

卫生志、教育志、宗教志现在也很适用。)

黎锦熙之所以能在抗日战争初期、人力、物力、财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到两年就取得这么显著的成绩，是因为他掌握了三条原则：(一)把修志工作和“抗战建设”的正确目标结合起来；(二)把修志工作和当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三)把修志工作和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四)把修志工作和教学、科研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没有明确的“抗战建设”的奋斗目标，没有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没有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没有西北联大各学系各教研室和有关研究机构的热忱支援，这部书是不容易写成的；写成了也不可能在史学界方志学界产生深远影响的。

《方志商》，二卷。上卷：《湖北通志义例商榷书》、《复李甥晓垣书》。下卷：《修志答问》(一名《修志刍言》)，《河北通志凡例》。

这部书重点讨论怎样编好《湖北通志》。有以下五个论点值得介绍：

一 关于修志的宗旨：

(一) 在国体、政法有所变革的新形势下，“修方志与往日宗旨略殊。社会之变迁，经济之状况，人民之生活，政治之设施，皆所宜详，不徒表章文献而已。”(《复李甥晓垣书》)

(二) “往日修志，于民事殊略。今日修志，应于民事加详。”
(《湖北通志义例商榷书》)

二 关于体例的拟订：

“宗旨既定，而编次体例，尤不可忽。”(《复李甥晓垣书》)

“宗旨既定，即应区分门类。往日修志，所分子目，大率以志名(如舆地志、经政志、艺文志、金石志、人物志之类)。本

书既称通志，若子目仍以志名，未免与大目复矣。拟仿《史》、《汉》之例，子目不与大目同（《史记》子目，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类。《汉书》子目，分纪、表、志、传四类），分为四门：一曰图，二曰记，三曰考，四曰传，借避重复之嫌。（士嘉按，李泰棻《方志学》持此说。不过，其他方志学家如王葆心等则认为，各以志称，于体无妨。）方志例有表谱。兹拟将表谱散归各卷，不专立此一门，以各卷有表者一半，专门一门，反不能包括也。”（《湖北通志义例商榷书》）

《湖北通志义例商榷书》还附录光绪《顺天府志·修志略例》，甘氏别举十四条以增益之。《河北通志凡例》末节补充六条。

三、关于取材问题：“所最难者，无书籍可考，无档案可查之事实耳。……例如农、工、商业之状况，户口之消耗，四民失业之原因，工价、物价、田价之比较，生产之衰旺，人民之担负，土货输出与外货输入之确数，近数十年所受之兵祸匪祸，水旱偏灾，均在所必详。……欲储备此种材料，非采访员得人，不可矣。”

采访宜先准备条目，按一定格式载入调查表册，报请省府颁给各县照办。

为了较好地完成采访任务，甘氏提议必须具备“热心、毅力、不辞劳瘁”的精神。（以上参考《修志答问》）

四、关于省志县志同时纂修的问题：“督修县志，为省志之豫备。……省志县志同时纂修，可以衔接一气，互相为用。有新修县志，则省志可以取材（约可十得六七）；有通志馆为之指导，则修县志亦易着手，此两利之道也。”（《复李甥晓垣书》）

五、关于篇目的拟订：
《湖北通志·总目》分图、记、考、传四大类，《修志答问》，

“记”改“表”、“传”改“录”，分为图、表、考、录四类，与《总目》所分图、记、考、传四类者不同，似宜以《总目》为凭。

为了反映湖北地区的特点包括外国入侵的特点，甘氏增列：水道变迁图、矿区图、榷税局卡图、社会变迁记、水利记、外人通商记、租地记、行轮记、传教记、教会学校记、湖泊考、历代学派考、商务考和渔业考等篇目。

湖北旧志对于外国入侵诸事，不敢直书，也不敢详记。其他各省旧志大都如此。甘氏反其道而行之，颇具卓识。其他论点，也有足资借鉴之处。

可惜湖北通志馆虽然成立了将近二十年，并有著名学者甘鹏云、王葆心等人参加工作，但因政治腐败，经费无着，《湖北通志》始终没有修成。幸而甘、王二人在修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们留下方志理论遗产（王氏著有《方志学发微》），可供参考研究。

这里应当指出，黎锦熙、甘鹏云，因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对待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态度上，提法上，个别词句有些错误。但是总的说来，他们的成绩是主要的，而黎氏贡献尤大。当然，还有不足之处，例如，方志的性质，“史地两性、兼而有之”的提法是不够全面的，因为它是自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科技无所不包的综合著述，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都有参考价值。说它是一门边缘学科，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又如，关于史料如何整理、鉴别、组织、编写等问题，尚未提到重要的地位，进行充分的讨论。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黎氏通过学习，迅速转变立场，满腔热情地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科学的研究继续做出贡献。他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也是一位善

于批判继承、具有独特见解、勇于创新的方志学家。他已经掌握的方志理论贯穿于其所撰《同官县志》、《宜川县志》、《洛川县志》和《黄陵县志》(原名《中部县志》)之中。

杭州师范学院来可泓同志和西北师范学院路志霄等同志，一九八一年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年会上虚心接受我的意见，不辞辛劳，认真标点了《方志今议》和《方志商》这两部著作。湖南岳麓书社将以《方志学两种》为题付印问世。这确实是方志学界的喜讯，应当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当前，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支持下，全国已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省、市、县组织修志机构。在今年四月八日成立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领导下，修志工作，更将顺利开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今后将陆续编纂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思想性、科学性、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志，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培养修志队伍，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凡是有条件的大专院校相继设立方志学研究班，与此相适应的短期学习班也将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举办。《方志学两种》的出版，对于广大修志人员来说，非常及时，非常需要。在方志学理论研究方面，这部书无疑也将起着有益的参考作用。

我们深信，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经过大家不断的努力，深入的探讨、研究和论证，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在不远的将来一定可以创建起来，也一定能够创建起来。

本书之所以能及时与读者见面，为读者服务，是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和湖南岳麓书社的关怀支持分不开的。让我代表来可泓同志、路志霄等同志向他们致以由衷的感谢！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日于武昌

方志今议

黎锦熙 撰

路志霄 朱太岩
牛得权 唐凌 校辑

目 录

《方志今议》序	(13)
一、建议因缘	(19)
二、先明三术	(20)
三、次立两标	(21)
四、次广四用	(22)
五、终破四障	(24)
六、结前原则	(28)
七、县志拟目三十篇，附两种	(28)
(1) 全志之总纲凡三篇	(28)
(2) 疆域总图附总说	(28)
(3) 大事年表	(29)
(4) 建置沿革志疆域沿革表、附图，县城详图及城坊衙署考，分区概略及铺坝集市乡镇考	(29)
(5) 关于自然方面者凡六篇	(32)
(1) 地质志附图	(32)
(2) 气候志附图表	(33)
(3) 地形志附图，山脉略说	(38)
(4) 水文志附图，水道略说	(40)
(5) 土壤志附图表	(42)
(6) 生物志植物、动物，附图	(43)
(6) 关于经济方面者凡六篇	(44)

人口志	消长，移动，密度，籍贯，职业，附调查纲目	(44)
农矿志	农业，畜产，蚕桑蜂蜜，渔业，矿业，林业，附调查纲目，矿业	(48)
工商志	工艺，商业，经济市集，附调查纲目	(63)
交通志	道路，航运，交通工具，运输，邮电	(69)
水利志	渠堰，坝井，水力利用	(77)
合作志	仓储，救济（慈善机关，账务，附灾荒表），新合作事业	
		(81)
(4) 关于政治方面者	凡七篇	(84)
吏治志	县政府组织沿革考、附表，职官表，行政纪略	(84)
财政志	省税（田赋，契税，牙税，育屠斗税，烟酒税），地方税（省税附加，杂税捐，公产），金融货币，附度量衡	(86)
军警志	保安，附匪祸考，警察，兵役	(91)
自治保甲志	选举表，保甲	(93)
党务志	县区党部，民众团体	(96)
卫生志	人民体格及疾疫，医药，禁烟，缠足及发辫	(96)
司法志	监狱，附要案汇录	(98)
(5) 关于文化方面者	凡八篇，附二种	(99)
教育志	科举教育，科第表，教育行政，经费，学校教育，毕业表，社会教育	(100)
宗教祠祀志	佛教及群祀，道教及杂祀，佛教，回教，基督教	
		(105)
古迹古物志	冢墓，建筑物及传说，石刻，铜器陶砖及艺术品	
		(107)
氏族志		(110)
风俗志	日常生活（食，衣，住及用具，职业，家庭娱乐等活动，	

附调查纲目),礼节(婚,丧,祝贺,岁时),术数迷信	(111)
方言风谣志方言,方音系统,谚语,通俗文艺(歌谣,杂曲,戏剧,杂要)	(118)
人物志列传,人物品类表,附图,忠义表,节孝表	(124)
艺文志分十部	(126)
附:城固文征附城固丛书	(127)
八、纂修总例	(129)
九、材料来源	(130)
十、总结全文	(131)
附录:《洛川财政志》单行本卷头语	(134)
《洛川教育志》单行本卷头语	(135)
《洛川方言谣谚志》单行本卷头语	(136)
《洛川县志》序	(137)
《同官(铜川市)县志》序	(146)
《中部(黄陵)县志》序	(148)
《宜川县志》序	(150)

《方志今议》序

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从西安迁往陕南，大都步行过秦岭，师生职工，配列队伍，名曰“行军”。行到褒城北境始出山，学生千人屯褒城沔县，教职员进屯南郑，议定校本部设在城固。国文系同事咸宁唐君祖培先到城固找住所，在一家饭馆的门首，遇见一位十年不见的同乡老同学，寒暄之后，询其何时来此，有何贵干？乃知即城固县长大治余君正东也，任职四年矣。坚邀唐君夫妇寓其署中。四月，学校部署定，旋开课，一日，唐君谓我曰：“长为食客，且奈何？”我应之曰：

“无已，其修志乎！”遂倡议，又得联大各院系同事湘乡黄君国璋等力赞其成，余君便组织“城固续修县志委员会”，聘任委员十五人，旧志局员纳其中，而县长为当然委员；又互推常务委员五人，县长为主席，余被推者，邑绅王君化溥、陈君瑾、高君杞及我是也；又设总务处，县长为主任，王君副之，专掌经费、设备、印刷等事宜；又设调查编纂两委员会，全邑小学校长及联保主任皆为当然调查员，而编委则大抵联大教授及本邑学界人士也。凡此皆名誉职，其有给者，名“专门技术员”，大抵联大毕业生为之；调查及编纂专员驻会者亦略给酬。组织既成，工作开始，一面推我草定“续修工作方案”，一面由黄君指挥“经济”、“自然”两部门技术员出发调查，而何君士骥亦指挥“文化”部门技术员从事碑拓及照像。迄九月，余君调任南郑县长，继之者为南宫鞠君海峰。我这“方案”费了一月之力才